

नारायण



印度古代史诗

《摩诃婆罗多》导读

黄宝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 录

题记	(1)
前言	(1)
一 翻译缘起	(1)
二 《摩诃婆罗多》的成书年代	(5)
三 关于《摩诃婆罗多》精校本	(11)
四 《摩诃婆罗多》的社会背景	(14)
五 《摩诃婆罗多》的神话背景	(18)
导读	
《摩诃婆罗多》核心故事梗概	(25)
婆罗多族谱系	(27)
一 《初篇》	(29)
二 《大会篇》	(36)
三 《森林篇》	(40)
四 《毗罗吒篇》	(54)
五 《斡旋篇》	(57)
六 《毗湿摩篇》	(64)
七 《德罗纳篇》	(75)
八 《迦尔纳篇》	(83)
九 《沙利耶篇》	(90)
十 《夜袭篇》	(97)
十一 《妇女篇》	(100)
十二 《和平篇》	(102)
十三 《教诫篇》	(114)
十四 《马祭篇》	(118)
十五 《林居篇》	(122)

十六 《杵战篇》	(127)
十七 《远行篇》	(129)
十八 《升天篇》	(133)
后记	(137)
附录	
关于《摩诃婆罗多》精校本工作进展 的报告	苏克坦卡尔 (149)
《摩诃婆罗多》的起源和发展	丹德卡尔 (157)
《摩诃婆罗多》导言	布依特南 (177)
论《摩诃婆罗多》	英格尔斯 (199)
《摩诃婆罗多》插图	(211)

题 记

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汉语全译本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约有五百万字，装订成厚重的六册。考虑到许多读者无暇阅读全书，而又渴望了解这部享誉世界的印度史诗，出版社建议将我为这部译本撰写的前言、各篇导言和后记汇编成《〈摩诃婆罗多〉导读》，作为单行本出版，以适应读者需要。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欣然同意，并趁此机会，另外选译了四篇参考文章，作为这部导读的附录。

前 言

一 翻译缘起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中国早在五世纪初就已知道这两大史诗。鸠摩罗什（344—413）译《大庄严论经》卷五曰：“时聚落中多诸婆罗门，有亲近者为聚落主说《罗摩延书》，又《婆罗他书》，说阵战死者，命终生天。”但这两大史诗属于印度婆罗门教文化系统，也就没有进入中国历代佛教高僧的译经范围。倘若这两大史诗是佛教典籍，尽管卷帙浩繁，凭中国古代高僧们的译经能力和气魄，将它们转梵为汉是不成问题的。这样，这两大史诗的翻译任务延宕了一千多年，留给了我们。

1960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开设了一个梵文巴利文班，季羨林和金克木两位先生亲自执教五年，培养了一批弟子。这批弟子踏上各自工作岗位不久，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两位先生在“文革”中备受折磨，弟子们也是学业荒废。在“文革”后期，季羨林先生尚未“解放”，却在学术本能的驱使下，开始偷偷翻译《罗摩衍那》。从1973年到1976年，已经译出近三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了出版机会，季先生便乘兴继续译下去。在八十年代头五年中，七卷八册的《罗摩衍那》汉译本全部出齐。

随着季先生的《罗摩衍那》汉译本陆续出版，我们这些弟子很自然会想到什么时候能把《摩诃婆罗多》也译出来？《摩诃婆罗多》的篇幅相当于《罗摩衍那》的四倍，令人望而生畏。而根据西方学者译介《摩诃婆罗多》的经验，可以先从其中的插话入手。早在五十年代，金克木先生就曾选译《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著名插话故事《莎维德丽》，发表在《译文》杂志上。1979年，金先生又译出《摩诃婆

罗多》的楔子《蛇祭缘起》，并写了一篇剖析文章，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上。当时，我的同学赵国华有志于献身《摩诃婆罗多》翻译，译出了另一个著名的插话故事《那罗和达摩衍蒂》，于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随后，赵国华与席必庄和郭良鏊合作，由金先生开列插话故事篇目，译出了《摩诃婆罗多插话选》，于198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在金先生支持下，赵国华约定席必庄、郭良鏊和我一起合作翻译《摩诃婆罗多》全书。译文决定采取散文体，译本拟分作十二卷。金先生亲自动笔翻译了《摩诃婆罗多》的前四章。这前四章中包含全书的篇目纲要，翻译难度很大。金先生的译文为全书的翻译起了示范作用。

当时，我和郭良鏊手头有别的工作，与赵国华商定，我们从第五卷开始参加进去，前四卷主要由他和席必庄承担，先译起来。这样，到了1986年，他和席必庄译出了第一卷。可是，这时国内出版社普遍开始注重经济效益，在寻找出版单位方面遇到了困难。直至1990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学术事业为重，接纳了这个出版计划。

就在译出第一卷后不久，赵国华在平时读书中，突然获得一个学术灵感。他从解开八卦符号原始数字意义入手，探讨原始人类的生殖崇拜文化。前后用了两年时间，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广泛搜集材料，调动自己毕生积累的知识学养，写成一部三十万字的专著《生殖崇拜文化论》，于1990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学术界赢得好评。他本人也有意于将这门课题的研究继续引向深入。他自信地认为“如果能将产食经济文化与生殖崇拜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文化人类学会发生一场革命”。

在这个时期，赵国华如痴如醉，与我们相见，言必“八卦符号”和“生殖崇拜”。但他也念念不忘《摩诃婆罗多》的翻译宏图。1990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决定出版《摩诃婆罗多》后，他再次和我们商定翻译计划的分工和实施，由我和郭良鏊承担第五、九、十和十一卷的翻译，其他各卷的翻译由他和席必庄承担。

不料，正当《摩诃婆罗多》翻译工程重新启动之时，赵国华于1991年突发心肌梗塞，猝然逝世。他年仅四十八岁，正处在学术生命

的巅峰期。噩耗传开，他的老师、老同学和同事们无不为他英年早逝而扼腕痛惜。《摩诃婆罗多》第一卷《初篇》于1993年年底出版，他也未及看到。当时，我们读到这第一卷译本的后记中，赵国华写有这样的话语：“翻译这部大史诗，却犹如跋涉在无际的沙漠，倾尽满腔热血，付出整个生命，最终所见或许只是骆驼刺的蒙眬的绿。好吧，就为了那蒙眬的绿！”读来仿佛是他的讖语，令人黯然神伤。命运有时确实显得过于残酷。

赵国华逝世后，对于这项翻译工程是否继续进行下去，我们有些犹豫。而《摩诃婆罗多》第一卷问世后，社会反响很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希望我们继续完成《摩诃婆罗多》全书的翻译，并委托我主持这项工作。我考虑到《摩诃婆罗多》本身的文化意义，也考虑到应该实现亡友赵国华的遗愿，便决定担起这份责任。席必庄和郭良鏊是原定的参加者，我又邀请葛维钧和李南参加进来。后来，段晴也志愿加入我们的行列。翻译工作基本按照第一卷确定的体例进行。这项翻译工程也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支持，于1996年列为院重点科研项目，并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

这样，又经过近十年的艰苦努力，我们终于完成全书的翻译工作。全书原计划分成十二卷出版，现在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合并成六卷。按照最初的翻译设想，大家分头翻译，文责自负。后来，季羨林先生提醒我，这样的集体翻译，译文应该互相校订一下。由于大家手头的工作都很繁重，全书的译文便由我负责校订和定稿。1993年版的《摩诃婆罗多》第一卷《初篇》这次重新排版，与《大会篇》合成一卷，作为新版第一卷。趁此机会，我也对《初篇》译文作了校订。原有的“翻译说明”和“后记”作为附录收入新版第一卷，以示对赵国华翻译《摩诃婆罗多》首创之功的纪念。

《摩诃婆罗多》这部史诗规模宏大，内容庞杂，为方便读者阅读，我决定为每卷译文撰写导言。导言的任务是介绍每卷的主要内容，进行简要的评析，也可以提供必要的文化背景资料，或对值得研究的问题做些提示。这样做也有助于对《摩诃婆罗多》的深入研究，符合我们翻译这部史诗的本意。

当然，按照金克木先生在“译本序”中表达的想法，译者可以不

写这样的导言，让读者自己去读。但我考虑再三，还是忍不住要这样做。这或许正如金先生所说：“译者本不需要在书前讲话，而似乎又不能不讲话。”因此，对于我撰写的这些导言，我也仿效金先生的说法：“读者可以看，也可以不看。”

二 《摩诃婆罗多》的成书年代

关于《摩诃婆罗多》的成书年代是梵文学者长期探讨和研究的一个问题，虽然不能说已经形成确切的定论，但也产生了一些多数学者可以在原则上表示同意的看法。

首先，我们可以排除一种将神话传说当作历史的印度传统说法，即认为《摩诃婆罗多》写成于公元前三千一百年。这种说法的依据是《摩诃婆罗多》中写道：

这位黑岛生大仙，
孜孜不倦整三年，
终于完成这杰作——
摩诃婆罗多故事。(1. 56. 32)^①

黑岛生即传说中的《摩诃婆罗多》作者毗耶婆（Vyāsa）的本名（出生在岛上，皮肤是黑的，故得此名）。《摩诃婆罗多》中又写道：

在迦利时代和
二分时代之间，
普五地区发生
俱卢般度之战。(1. 2. 9)

按照印度神话传说，迦利时代开始于公元前三千一百零二年，黑天死于迦利时代的第一天。又按照《摩诃婆罗多》故事，般度族五兄弟在黑

^① 《摩诃婆罗多》引文均依据印度班达卡尔东方研究所精校本，括号中所标数字依次为篇、章、颂。本节中的引文，我按照诗体译出，与本书采用的散文体译法有所不同。

天死后,结束统治,远行升天。而毗耶娑在般度族五兄弟升天后,开始创作《摩诃婆罗多》,用了三年时间。这样,成书年代便是公元前三千一百年。

这种成书年代貌似精确,但只能当作神话看待,绝对不足凭信。奥地利梵文学者温特尼茨(M. Winternitz)曾经提出《摩诃婆罗多》的成书时代“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之间”,尽管时间跨度八百年,长期以来反倒为多数学者所接受。温特尼茨的结论主要依据如下事实:首先,整个吠陀文献没有提及《摩诃婆罗多》,只有在一部年代无法确定的《阿湿婆罗衍那家庭经》(Āśvalāyana Gṛhyasūtra)中提到过两部圣书名《婆罗多》和《摩诃婆罗多》。最早明确记载俱卢和般度两族战争故事(虽然未提及书名《婆罗多》或《摩诃婆罗多》)的文献是波颠阇利(约公元前二世纪)的《大疏》。公元前三、四世纪的佛教巴利文经典没有提及《摩诃婆罗多》,只有其中的《本生经》提到这部史诗中的一些人物名,但具体事迹与史诗颇有出入。因而,《摩诃婆罗多》的原始形式不可能出现在吠陀时代结束前,即不可能早于公元前四世纪。其次,古典小说家波那(约七世纪)和哲学家枯马立拉(约八世纪)的著作以及公元五世纪后的铭文记载表明这部史诗在那时已经成为一部宗教经典,而且在篇幅上已经达到十万颂。因而,《摩诃婆罗多》的现存形式不可能晚于公元四世纪。^①

至于《摩诃婆罗多》在这漫长的八百年间的具体形成过程,学者们经过多年探讨,现在一般倾向于分成三个阶段:(1)八千八百颂的《胜利之歌》(Jaya);(2)二万四千颂的《婆罗多》(Bhārata);(3)十万颂的《摩诃婆罗多》。这三种字数的《摩诃婆罗多》故事,在现存抄本的第一篇中都曾提及:

我和苏迦知道
这八千八百颂,
或许全胜也知道
这八千八百颂。^②

① 参阅 M. 温特尼茨:《印度文学史》第1卷,新德里,1972,第454—475页。

② 这颂见《摩诃婆罗多》精校本《初篇》第884—885页校勘记。

他编了《婆罗多本集》，
共有二万四千颂，
里边没有加插话，
智者称作《婆罗多》。(1. 1. 61)

他又编了另一部，
颂数总计六百万，
其中一半三百万，
流传天国天神间。

列祖列宗百五十万，
罗刹药叉百四十万；
余下这个十万颂，
流传尘世凡人间。^①

这里所引第一和第三、四首见于某些抄本，精校本正文未收。第一首中的“我”是吟诵史诗的歌手，八千八百颂指最早由毗耶娑口授，群主记录下来的原始版本。^②第二、第三首中的“他”是指毗耶娑。当然，这八千八百颂和二万四千颂的说法也带有传说性质，但可以作为象征性的参考数字。因为《摩诃婆罗多》的篇幅经历了一个逐渐膨胀的过程，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摩诃婆罗多》的原始形式可能叫做《胜利之歌》。这是因为在一些抄本的开卷第一首献诗是这样的：

首先向人中至高的
那罗延和那罗致敬！

① 这两颂见《摩诃婆罗多》精校本《初篇》第12页校勘记。

② 《摩诃婆罗多》通行本（青项本）开头讲到毗耶娑创作了婆罗多故事，但不知找谁记录下来。于是，大神梵天推荐群主（象头神）担任毗耶娑的记录员。精校本编者认为这是晚出成分，因而没有采入正文。

向娑罗私婆蒂女神致敬！
 然后开始吟诵《胜利之歌》。(1. 1. 献诗)

另外，在《摩诃婆罗多》中，“胜利”一词有时也直接作为这部史诗的代名词。例如：

渴望胜利的人都应听取
 这部名曰《胜利》的历史，
 听后他能征服大地，
 也能击败一切仇敌。(1. 56. 19)

可以设想，毗耶娑的《胜利之歌》讲述的是婆罗多族大战的核心故事。毗耶娑将这《胜利之歌》传授给自己的五个徒弟，由他们在世间漫游吟诵。这些徒弟在传诵过程中，逐渐扩充内容，使《胜利之歌》扩大成各种版本的《婆罗多》。

向苏曼度和闍弥尼，
 向拜罗和儿子苏迦，
 传授四部吠陀以及
 第五部《摩诃婆罗多》。(1. 57. 74)

赐人恩惠的尊师
 也向护民子传授，
 从此婆罗多本集
 由他们分别传诵。(1. 57. 75)

现存《摩诃婆罗多》是护民子传诵的本子。毗耶娑的这五个徒弟实际上是各种宫廷歌手苏多^①和民间吟游诗人的象征。据此我们可以想像《摩诃婆罗多》的早期传播方式及其内容和文字的流动性。

^① 苏多 (sūta) 通常是刹帝利男子和婆罗门妇女结婚所生的儿子。他们往往担任帝王的御者和歌手，经常编制英雄颂歌称扬古今帝王的业绩。

如果说从《胜利之歌》向《婆罗多》的演变，主要是充实故事内容，“里边没有加插话”。那么，从《婆罗多》向《摩诃婆罗多》（意译是《伟大的婆罗多》或《大婆罗多》）的演变，主要不是充实故事内容，而是汇入大量与核心故事关系不太紧密的插话。这些插话大多是可以独立成章的神话传说、英雄颂歌、寓言故事以及婆罗门教的哲学、政治、伦理和法律论著。精校本首任主编苏克坦卡尔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二万四千颂左右的《婆罗多》曾经一度被婆罗门婆利古族垄断。由于《婆罗多》是颂扬刹帝利王族的英雄史诗，因而婆利古族竭力以婆罗门观点改造《婆罗多》，塞进大量颂扬婆利古族和抬高婆罗门种姓地位的内容。此后，原始的《婆罗多》失传，代之以《摩诃婆罗多》流传至今。^①

关于这部史诗的作者毗耶娑，我们目前所知道的都是传说，很难断定他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既是这部史诗的作者，又是这部史诗中的人物。按照史诗本身的故事，毗耶娑是渔家女贞信嫁给福身王之前的私生子，名叫黑岛生。贞信和福身王的儿子奇武婚后不久死去，留下两个遗孀，面临断绝后嗣的危险。于是，贞信找来在森林中修炼苦行的黑岛生，让他代替奇武，生下三个儿子——持国、般度和维杜罗。此后，毗耶娑仍然隐居森林，但他目睹和参与了持国百子（俱卢族）和般度五子（般度族）两族斗争的全过程。在般度族五兄弟升天后，他创作了这部史诗。如果史诗中的这些内容不是后人杜撰添加的，那么可以认为毗耶娑是这部史诗的原始作者。

按照印度传统，毗耶娑不仅被说成是《摩诃婆罗多》的作者，还被说成是四吠陀的编订者、往世书的编写者、吠檀多哲学经典《梵经》的作者，等等。将相距数百乃至上千年的著作归诸同一作者，显然是荒谬的。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毗耶娑这个名字本身具有“划分”、“扩大”、“编排”等含义。因此，将毗耶娑看作一个公用名字或专称，泛指包括《摩诃婆罗多》在内的古代印度一切在漫长历史时期中累积而成的庞大作品的编订者，也未尝不可。在往世书神话中，就提到有二十八个毗耶娑，依次在循环出现的二分时代，将吠陀编排一

^① 参阅苏克坦卡尔《婆利古族和〈婆罗多〉》，载《苏克坦卡尔纪念文集》第1卷，孟买，1944，第278—337页。

次。这或许可以作为这一看法的一个佐证。

由于印度古代史学不发达，可供引为旁证的史料有限，近代以来，印度国内外学者对《摩诃婆罗多》成书过程的研究只能主要依据这部史诗本身，以印度古代宗教和文化发展背景为参照，探寻它的思想内容中隐约存在的差异、层次和发展轨迹。1986年，印度班达卡尔东方研究所出版了耶尔迪（M. R. Yardi）的《〈摩诃婆罗多〉的起源和发展——统计学研究》。这部著作另辟蹊径，对《摩诃婆罗多》的诗律进行统计学研究，试图由此确定这部史诗的内容层次和发展过程。

《摩诃婆罗多》全书绝大部分采用一种简单易记的阿奴湿图朴（anushtubh）诗律。这种诗律的一般规则是每颂（“输洛迦”）即每个诗节两行四个音步，每个音步八个音节，总共三十二个音节。每个音步的第五个音节要短，第六个音节要长，第七个音节长短交替。除了这几个音节之外，其他音节长短自由。耶尔迪正是依据那些自由音节的长短音使用特点，运用统计学方法，归纳出五种诗律风格，分别代表《摩诃婆罗多》文本中的五个层次或五个发展阶段。按照他对《摩诃婆罗多》精校本的统计，全书共有75595.5颂。其中，最初由护民子诵唱的《婆罗多》有21161.5颂，此后，毛喜增加17284颂，毛喜之子厉声增加26728.5颂，《诃利世系》作者增加9053颂，《篇章总目篇》作者增加1368.5颂。

依据《摩诃婆罗多》现存文本，整个故事是由厉声讲述给飘忽林中的仙人听的，而厉声讲述的故事又是在镇群王蛇祭大会上从护民子那里听来的。同时，厉声讲述的故事中也包含他从自己的父亲毛喜那里听来的内容。《诃利世系》是《摩诃婆罗多》的附篇。《篇章总目篇》是《摩诃婆罗多》第一篇《初篇》中的第二章。耶尔迪对《摩诃婆罗多》中分属这五个层次的篇目章节都有具体说明。

按照耶尔迪的看法，通常所说的十万颂《摩诃婆罗多》应该包括《诃利世系》在内。因为根据《篇章总目篇》中提供的《摩诃婆罗多》篇章颂数，总共也只是八万二千多颂。而根据现存通行本（青项本），《摩诃婆罗多》约八万四千颂，《诃利世系》约一万六千颂，这样，总共约十万颂。这也是通行本编者青项明确表示过的看法。^①

^① 青项的通行本是北方传本。然而，按照南方传本，《摩诃婆罗多》本身就有十万颂。

耶尔迪的这项统计学研究花费了十余年时间。当然，他的研究结论还有待验证。无论如何，对《摩诃婆罗多》成书过程的研究，采取多种视角，运用多种方法，确实是应该提倡的。

三 关于《摩诃婆罗多》精校本

我们的译文依据印度班达卡尔东方研究所出版的《摩诃婆罗多》精校本。这里值得介绍一下这个精校本的编订过程和校勘原则。

如上所述，《摩诃婆罗多》在古代印度始终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创作和传诵。这部史诗经历了漫长的成书过程，现存形式大约定型于四世纪。有关文献记载表明这部史诗在那时已经成为一部宗教经典，篇幅为十万颂。此后，这部史诗以抄本的形式传承。抄写使用的材料主要是桦树皮和贝叶。

到了十九世纪，开始出现《摩诃婆罗多》的印刷文本。《摩诃婆罗多》的各种抄本大体分为南北两种传本。而最早整理出版的两种文本——加尔各答版本（1839）和孟买版本（1863）均属于北传本。显然，为了适应现代研究的需要，应该利用各种抄本，进行认真校勘，编订一部《摩诃婆罗多》精校本。

最早主张编订《摩诃婆罗多》精校本的学者是奥地利梵文学者温特尼茨（M. Winternitz）。他在1897年巴黎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上提出这个建议，旨在“为《摩诃婆罗多》研究以及一切与印度史诗有关的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在此后的几年中，他一再重申这个建议。开始的时候，只有少数学者赞同这个建议，而大多数学者持怀疑态度，认为“要编出这部史诗的精校本是不可能的。现有的加尔各答版本和孟买版本已经足以代表北印度版本，我们只能满足于再编印一部南印度版本”。直到1904年，国际科学院协会采纳了温特尼茨的这个建议，决定着手编订《摩诃婆罗多》精校本。在柏林和维也纳科学院的资助下，编订工作开始启动。德国学者吕德斯（H. Lüders）首先编了一个精校本样本（《摩诃婆罗多·初篇》的头67颂），于1908年提交给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此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学者从事的这项编订工作

中断，不了了之。

1917年，印度班达卡尔（Bhandarkar）东方研究所成立，决定编订《摩诃婆罗多》精校本。1919年，编订工作正式启动。1923年，乌特吉卡尔（N. B. Utgikar）编出《摩诃婆罗多·毗罗吒篇》精校本（试验本），分送国内外梵文学者征求意见，受到普遍好评和热情鼓励，并提供了许多建设性意见。1925年，苏克坦卡尔（V. S. Sukthankar）担任《摩诃婆罗多》精校本主编，印度许多著名梵文学者参加这项工作。1933年出版精校本第一卷，1966年出齐全书，共十九卷。整个编订工作历时将近半个世纪。其间苏克坦卡尔于1943年逝世，继任主编是贝尔沃卡尔（S. K. Belvalkar），最后一任主编是威迪耶（P. L. Vaidya）。

班达卡尔东方研究所编订《摩诃婆罗多》精校本的工作步骤，首先是搜集和整理《摩诃婆罗多》的各种抄本，以通行的《摩诃婆罗多》青项本（Nilakantha）为基础，逐字逐句进行对勘，记录下不同之处。收集到的抄本共有一千二百多种，其中全本占少数，多数是单篇抄本。这些抄本的年代绝大多数属于十五世纪以后，其中流行最广的天城体青项本是十七世纪晚期的产物。抄本的书写材料大多是贝叶和纸张，少数是桦树皮。经过鉴别，确定具有校勘价值的抄本，排除重复的抄本。这样，用作校勘的抄本为七百多种。

《摩诃婆罗多》的抄本分为北传本和南传本两大类。北传本又可按字体分为舍罗陀、尼泊尔、梅提利、孟加拉和天城体传本，南传本也可按字体分为泰卢固、葛兰陀和马拉雅拉姆传本。这些传本也还可以作出进一步细分。各种抄本在词、句、诗行、诗节上存在不同程度的歧异。总的说来，南传本的篇幅大于北传本。北传本全书分为十八篇，南传本分为二十四篇。与北传本相比，南传本在故事细节描写上更为丰富，词句更为正确，语义更为连贯。因此，北传本可称作“简朴本”（*textus simplicior*），南传本可称作“修饰本”（*textus ornatior*）。

在北传本中，舍罗陀字体本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传本，最少受其他传本影响，保存了这部史诗比较古朴的形式，因而它对于编订精校本最有参考价值，在校勘过程中最受重现。

在校勘中，优先采纳北传和南传各种抄本一致的词、句、诗行和

诗节。但各种抄本完全一致的地方毕竟有限，更多的情况是互有差异。凡有差异，则采纳南北传本多数抄本一致的地方，也可采纳北传抄本之间或者南传抄本之间一致的地方。凡与上下文不协调或不连贯的篇章、诗节或诗句，只要不见于一种重要的抄本，便可作为衍文删去。

古代写本在传抄过程中，一般容易简化难词僻语。而按照校勘原理，一些难词僻语可能恰恰表明它们是古老原始的形式。如果许多抄本在这些地方具有一致性，就不应该怀疑它们是错讹。史诗的原始文本不一定语言规范，措辞精确。“简朴本”往往比“修饰本”更接近原始形式。因此，不管校勘的结果怎样，都应该尽可能客观地依据抄本提供的证据，确定精校本的文本。

在校勘中，重要的是作出解释和说明，而不应该随意改动原文。对于明显的传抄中形成的错讹，则在有关词句下面加上曲线。有时北传本和南传本出现歧异，而两种读法都能读通，也在有关词句下面加上曲线。

校勘的目的无非是“求古本之真”，恢复作品的原始形式。但对于《摩诃婆罗多》来说，这是一种不可企及的理想。与一般的古典作品不同，史诗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创作和传诵，文本始终处在流动中，现有的规模也是逐渐扩充而成，很难确定它的原始形式。因此，《摩诃婆罗多》精校本不是恢复传说中的毗耶娑创作的《摩诃婆罗多》，也不是恢复毗耶娑的弟子传诵的《摩诃婆罗多》。它只是在现存的各种并不古老的抄本基础上，提供一种尽可能古老的版本，也就是可以称作现存所有抄本的共同祖先的版本。

这样，最终完成的这部《摩诃婆罗多》精校本排除了传抄中的一些错讹和伪增，也抢救了在传抄中逐渐流失的古老成分，而成为现存抄本中最古老和最纯洁的版本。精校本的篇幅总量不是十万颂，而是近八万颂。但它以校勘记和附录的方式将所有重要抄本的重要异文一一列出。这使它实际上比现存任何抄本都完全，确实为《摩诃婆罗多》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摩诃婆罗多》精校本于1966年出齐后，班达卡尔东方研究所又继续完成《摩诃婆罗多》的附篇《河利世系》的校勘本（两卷本，1969—1971），并编制了《摩诃婆罗多》诗句索引（The Pratikā Index

of the Mahābhārata, 六卷本, 1967—1972)。同时,《摩诃婆罗多》文化索引(The Cultural Index to the Mahābhārata)编制工作也在进行之中,已经出版第一卷第一分册(1993)和第二分册(1995),全部索引的完成还有待时日。这些工作都为《摩诃婆罗多》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

我们的译文原则上依据《摩诃婆罗多》精校本正文,精校本中列出的异文只是用作参考。我们坐享精校本的校勘成果,理应向前仆后继从事这项校勘工作的印度梵文学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四 《摩诃婆罗多》的社会背景

史诗的叙事特点是现实和神话交织。《摩诃婆罗多》呈现的是神话化的历史。因此,现代读者阅读《摩诃婆罗多》应该对印度史诗时代的社会背景和神话形态有所了解。

印度现存最早的文献是四部吠陀本集:《梨俱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达婆吠陀》,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十五世纪至公元前十世纪。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学者通过印度古代语言和欧洲语言的比较研究,确认吠陀语和梵语属于印欧语系。而且,通过《梨俱吠陀》和波斯古经《阿维斯陀》之间语言、神话和宗教的比较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文化亲缘关系。同时,在小亚细亚出土的泥版文书中,有公元前十四世纪赫梯王和米丹尼王签订的和约,以一些吠陀神祇为见证者和保护者。由此,多数学者认为大约公元前十五世纪前,居住在中亚地带的部分雅利安人离开故乡,向南迁徙,一支向西进入伊朗,成为伊朗雅利安人;一支向东进入印度,成为印度雅利安人。

雅利安人原本是些游牧部落,在进入印度的初期,仍然过着部落生活。每个部落由若干村落组成,每个村落由若干父权大家庭组成。部落的首领称作王(“罗阇”),由部落“议事会”选举。有关部落的大事由“人民大会”讨论决定。因此,部落社会的政体具有共和制性质。而吠陀时代的部落社会战争频繁,开始是雅利安人征服以“达娑”(或“达休”)为代表的印度土著居民,后来是雅利安人各部落之